

国民党抗战国际政略简论*

左玉河

提 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 国民党逐渐形成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政略。该政略将中华民族之命运与世界局势的发展紧密相联, 将中国抗战与维护世界和平之大局紧密相联, 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大战结为一体, 以抗战到底、苦撑待变的方式, 将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自觉将中国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 意图实现中国独立自由之目标。事实证明, 国民党的国际政略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对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国民党 中国 抗战 国际政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 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逐渐形成中国抗战的国际政略, 认为中国必须借助国际力量才能取得对日作战胜利。国民党以广阔的世界眼光, 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结为一体, 将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将中国视为维护世界和平及反法西斯战争之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 意图实现中国独立自由的目标。本文将利用原始资料, 对国民党的抗战国际政略进行简要论述。

一 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 战时外交方针的确立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 尽管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但两国仍未宣战。两国之所以皆回避宣战行为, 实各自有所盘算, 立基于不同的国际处境。按国际法的规范, 宣战意味着将两国的军事冲突提升到法律层次的宣告行为; 国际社会在获知宣告讯息后, 则有严守中立的义务。对处于弱势的中国而言, 所谓宣战不啻是断绝争取外援的机会。尤其中日交战本属日本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 中国之应战只是求取自卫。故国民政府在1937年8月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 向国际社会郑重声明: 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侵略, 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 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公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 中国奋起抗战实际上是在维护领土主权及各种国际公约之尊严, “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 实为世界而奋斗; 非仅为领土与主权, 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①。正是基于这种外交策略考虑, 蒋介石除“坚信国联”之外, “维持九国公约”成为其重要的国际政略。国民政府重视运用外交手段获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展开全方位的多元外交: 一是请求召开有关国际会议, 冀以国际条约保护自己, 牵制侵略国; 二是派出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 担任负有特殊使命的外交使节, 通过正常外交途径, 直接与外国政府交涉, 争取外援。

1937年7月16日, 国民政府以备忘录送交九国公约签字国以及苏联和德国, 通报卢沟桥事变真相, 谴责日本“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指出“倘任其发生,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编号: 16KZD021) 的阶段成果。

① 《国民政府昨发表声明》, 《中央日报》(南京) 1937年8月15日, 第3版。

则足以在亚洲及全世界产生重大之后果。”^① 8月30日，中国向国联提出照会，陈述日本在卢沟桥事变以降的所作所为，乃是违犯《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以及《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9月12日，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正式申诉，请求国联对日本“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次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了第18次会议，专门讨论远东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破坏了国际公法，危及世界和平，要求采取集体安全措施制裁日本侵略者。但国联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而将问题转移到九国公约会议上。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中国代表顾维钧吁请与会各国援助中国，并提出四项制裁日本、援助中国的建议。中国方面在国际外交方面有所收获：一是中国成功将日本定位为和平秩序的破坏者，凸显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秩序者的新形象；二是日本纵然已退出国联，依旧是九国公约的成员国。借由国联决议案，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得以召开，中国获得向国际社会求援的机会。

1938年3月底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国民政府运用多元外交手段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的做法，并发表宣言郑重声明“从中国立场言，则为捍御外侮，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生存，从国际立场言，则为维护条约之尊严，对于破坏条约，甘为戎首者，予以坚决之抵抗；以是之故，凡爱好和平之国家，自政府以至人民，莫不同情中国，谴责日本。”中国战时对外关系谨守两项原则：一是对于曾经参加之维持国际和平之条约，必确实遵守；二是对于世界各国既存之友谊，必继续不懈，且当更求其增进。国民党反复陈述中国与世界局势之密切关联，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分之利害，即全体之利害，故每一国家谋世界之安全，即谋自国之安全，不可不相与戮力，以致力于保障和平，制裁侵略，俾东亚已发之战祸，终于遏止，而世界正在酝酿之危机，亦于以消弭，此则不惟中国实受其益，世界和平胥系于此矣。”^②

为此，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战时外交方针为：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③ 国民党确定的战时外交方针，体现了国民党开放的国际视野和广阔的世界眼光。

国民党将“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确定为战时外交之首要方针，是有意识地将中华民族的抗战置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进程中，强调中国与国际社会休戚与共。国民党反复强调，中国抗战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而非日本民众，劝告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侵华战争，以免害人者自害“即为日本计，若遂其侵略之欲，作为穷兵黩武，永无底止，势必重困其民，以害人者自害。”国民党多次严正申明：“中国此次抗战，实为东亚百年之大计，非惟对日本国民无所仇恨，且期待其促成日本军阀最后之觉悟。”^④ 国民党视中国抵御日本侵略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举动，而非中日两个民族之单独

①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第254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7页。

③ 参见《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387页。

④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406页。

对抗,体现了中国自觉融入国际秩序的努力。

国民党在随后召开的历次中央全会上,均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及其局势变化联系起来考察,强调中国抗战之国际影响及保障世界和平之重要意义。如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宣言声明“吾国今日之所以坚决抗战者,其目的固在抵御侵略吾国之敌人,恢复我主权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实亦为惩创破坏条约尊严,危害世界和平之戎首。切望举世维护和平之友邦,发挥协同一致之精神,保障利害共同之条约,施有效之方法,消蔓延之战祸,尽必如此,乃可以求得世界人类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①1939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向国际社会宣告:信任友邦,保障世界和平,坚持既定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日本侵略,以保障我主权、领土、行政的完整;遵守国际公约,尤其是九国公约、国联盟约与非战公约;不参加防共协定;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拘束。^②1940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则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外交应“联合在太平洋关系密切之国家,维持《九国公约》之尊严,安定太平洋之局势”。全会宣言重申“吾人即认定此次作战意义,不惟自保民族之生存、国家之独立,更所以维护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诚以安定亚洲之重心,必为我独立自由不受侵犯之中国,且必亚洲有真实之和平,而后世界始有安全之基础。”^③反复强调中国抗战对保障世界和平的意义,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二 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抗战国际政略的形成

陈诚描述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及国民党对抗战前途估计时说“我们只能说确有牺牲的决心,并没有制胜的把握。”^④国民党政府认识到,美国宣布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后,中国已不容为任何一国所独占,日本欲鲸吞中国必将引起国际间的干涉。“单独抗日战争,我们纵然没有制胜的把握,但当这一战争成为世界战争的一部分时,那我们就一定没有最后胜利的把握。”基于这种认识,国民政府做出乃有“持久消耗战”最高战略之策定。国民党坚持“持久消耗战”的目的,是争取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世界反日势力援助下取得抗战最后胜利。陈诚后来总结抗战胜利经验时说“我们如说日本是被我们给打垮了的,不如说日本是被拖垮的,以一个工业落后、装备羸败的国家,和一个世界第一等强国作战,前后历时八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不失为是一大奇迹。”^⑤

正因如此,蒋介石和国民党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关注欧洲局势对中国抗战的影响。陈诚在1939年5月向蒋介石提供的关于欧战局势判断的陈述中,对当时的欧洲战局进行冷静观察,建议欧战万一发生后中国应取之立场。他分析说:欧战爆发以后,无论日本参加德意轴心作战,或虚与德意委蛇,我国本于维护国际正义和平及反抗侵略主义之一贯立场,均应断然参加反德意集团,置国命于世界总决算之立场,自属毫无疑问。如日本中途变节,与英法妥协,则在苏美严密监视之下,英法亦不便公开助日压迫中国,彼等反侵略之盟友。若苏日均守表面中立,在中日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431—432页。

② 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489页。

③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509页。

④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⑤ 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152页。

战争未结束以前，中国自当以侵略国家为敌，借以阻碍英法与日本之妥协。至于德意，彼时正倾其国力应付欧战，当然无法有所利害于我，吾人自不能离开可能援我之英法，而结好于助日之德意。他颇有洞见地强调“吾人确信日本如不能征服世界，即永远不能灭亡我中国，盖中国问题，亦即世界问题，中日最后之命运，殆将取决于未来之大战。”故建议中国外交注重之点：“自当固守自主之立场，因机制宜，通权达变，结好友邦，而不依赖友邦，寻求与国，而不能屈从与国。”^①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将中日战争最后之命运取决于世界大战的战局，是陈诚的基本观点。如果说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宣布“抗战到底”的“底”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话，那么随着欧战爆发，蒋介石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日益清晰，对抗战到底的“底”有了新认识，正式形成将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世界大战的前途联系起来考虑的所谓国际政略。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同年9月9日的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致开幕词，将抗战与欧战联系起来，强调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的关联“中日战争问题，就是世界问题，而且是世界最大的问题，须知今日世界的战乱，完全是由日本侵略中国，破坏国际公约，扰乱世界和平的强暴行为所引起的。”因此“中日战争就是世界战争的起点，亦就是世界战局的重心”。^②按蒋介石的解释，欧洲战争是中日战争引起的，中日战争是世界战局的重心。蒋介石在同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南岳会议上，对欧洲战争与中国抗战的关系做了清晰说明，集中阐述他的抗战国际政略思想：中国抗战与欧洲战争“同时并进”，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中国持久抗战就是要等待这种“自然机运”的到来。他说“我们这次抗战，一方面在求中国之独立自由与平等；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国际信义与确立永久和平。我们认定中日问题，实在是世界问题之一环，只有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们这次抗战既发动之后，一定要与势在必起的世界战争连接起来，并且要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胜利。”^③这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国际政略。

按照蒋介石和国民党确定抗战国际政略，第一步是将抗战与欧战联系起来；第二步是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结为一体，借助国际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抗战能够坚持到欧战爆发，标志着国民党第一步国际政略的成功，接下来的目标是将东亚和欧洲的两大战争同时结束，彻底解决中国独立解放问题。他说“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如此，才可以彻底解决远东问题，真正获得永久的和平。”他强调“就整个战局形势来看，可以说：我们现在还只战到胜利的中途，要想达到胜利的目的，一定要坚持到欧战结束，世界问题得到解决之日，始能获得抗战最后的成功。如其不然，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我们若急求速了，妄想日本妥协讲和，这就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这是我们抗战一贯的方针与最大的政策。”^④只要中国抗战能够坚持到欧战胜利，那么中国独立问题必定能够随着世界问题而最后解决。

1939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的

① 王志昆等主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外交（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3—134页。
② 蒋介石《欧战发生后我国抗战的三大要务》，《“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演讲》，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376页。
③ 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演讲》，第425页。
④ 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演讲》，第426页。

演讲,报告抗战前途和国际大势,对“抗战到底”的“底”做了新解释。他说“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们抗战的目的,如何乃能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为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事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蒋介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思路?他解释说“因为中日问题,我常说并非简单的中日两国的问题,乃是整个东亚亦即整个世界的问题,而且今日中国问题,实为世界问题的中心。”^①可见,此时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包含有取得中国独立并收复被日本攫取的中国领土主权的内涵。

蒋介石在此次演讲中,再次对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之接轨,做了明确的宣示“故中国问题的解决,一定要和整个东亚或整个世界问题同时解决始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否则,世界问题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也就不能解决,而我们中国依旧不能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因此,中国抗战在时间上,尤其最后问题的解决上一定要和世界战争连结起来,使远东问题,与欧洲问题随今日东亚西欧战争之终结而同时解决,以重建世界永久安全幸福与和平,然后我们国家民族才获得一条光明的出路,得以达到复兴的目的!”他最后强调“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心一意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的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中国更必然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②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国民党所确定的抗战国际政略,主要是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大战结为一体,以苦撑待变的方式,“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的机运”,将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自觉将中国抗战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以实现中国独立自由之目标。而要最终实现这个抗战国际政略,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到底”战略而不投降,静观国际局势的变化,待到日本与英美矛盾激化而爆发冲突,即可将中国抗战融入世界反侵略战争,彻底解决中国独立解放问题。

三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联成一片: 抗战国际政略的实现

欧洲战争爆发,虽然带来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接轨的机会,但中国仍需在亚洲单独抗战之处境并没有改变。因欧战失利,法英两国相继关闭所属殖民地联系中国的交通渠道。英美这种为求自保的做法,激起国民政府部分人士的不满。他们主张调整外交关系,放弃传统的亲英美政策,改采德意苏诸国之策略。但蒋介石并未改变原有的国际政略,依旧重申既定抗战外交方针没有调整的的必要,反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为“我所日夕求不得者也”。1940年7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上致词时表示,真正具备左右时局实力者,是目前尚未直接卷入欧战旋涡的美苏两国。就此而言,在关键的美苏两国尚未改变对日本的警戒态度以前,“我们的抗战外交,仍旧可以照预定的目标进行,没有改动的必要”。故他提出“坚持抗战不变”“维持九国公约不变”“对太平洋关系各国的外交方针不变”等“三不变”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以苦撑待变的方式顽强地实施着抗日国际政略^③。

① 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演讲》,第477页。

② 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演讲》,第477—478页。

③ 参见蒋介石《目前外交之一般检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7《演讲》,第382—385页。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与日本互相宣战。中国亦于同日正式对日本和德国宣战，中国走出独立抗日的困境。蒋介石日记记载“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日已达于顶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戒惧。”12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第九次中央全会开幕词中说“敌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我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片。”^①故国民党政府发表宣言，向国际社会表示中国愿“以安危与共患难相扶之精神，与反侵略各友邦迅速成立统一强国之阵营，力谋军事、政治、经济之密切合作，相互提携，团结一致，决不为单独之媾和，必期达到解除侵略国之武装，保证人类经济生活之机会平等，与重奠世界永久和平秩序之目的”^②。

蒋介石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坚持持久抗战以等待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之解决而解决的“自然机运”。他对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论述，往往是从他的战略政略出发的，故蒋介石始终企望美英苏抑制日本侵略，并力图将其拉入对日战争。因此，蒋介石将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看成是国民党国际战略政略的成功，是有其理由的。

蒋介石在1942年10月22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开会致词时回顾说：1941年12月8日敌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我国接着就对日寇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从此我国就与世界上拥护和平正义的盟邦，并肩作战；我从前所预测的中日战争必将与世界战争联结起来，也于此实现。这一年来内外局势的变迁，就以这一件大事为契机而发展”。他强调“世界上所有欧亚美非各战场，完全是利害成败绝对一致。”^③蒋介石对太平洋战争极为重视，把太平洋战争爆发看作国民党政府国际政略的成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宣战；还决定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加拿大等国军事同盟，由美国作领导。随后在1941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对中国战时外交政策做了部分调整。该决议案规定“国际形势已分为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线，今后外交上所当努力者，一为战时如何加强各国友邦协同作战之效能，以争取反侵略战争之胜利；一为如何与各友邦加强合作，以确立保障世界永久和平之国际组织。外交当局与有关机关应本此方针，多方策划，至于战后与各友邦条约之改订，以及运用外资开发我国工业，均为我国一贯国策，亦当预为规划。”^④蒋介石踌躇满志，一面筹组国际军事同盟，一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大国地位。

国民党政府派出外交官员与英、美交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等关系。英美对中国的废约呼声作出反应，于1942年10月10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立即放弃在华特权；此后经两个多月的谈判，于1943年1月11日分别签订了取消在华特权的中美、中英新约。继美、英之后，挪威、巴西、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瑞典分别与中国签订新约，废止在华特权。法国、丹麦、瑞士、葡萄牙等国在战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些新约宣布正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废止《辛丑条约》，取消租界，取消外人沿海和内河航运特权，取消外籍领港人，取消旧条约中关于通商口岸与商埠的规定，废除总税务司须录用英国人的规定。近百年来中国丧失的主权大都得

① 蒋介石《加强抗战力量，确立建国基础》，《“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演讲》，第438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第589页。

③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下册，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652页。

④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42页。

到恢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平等合法的地位得到公认。

罗斯福为鼓励中国积极对日作战并在战后能成为抗衡苏联的力量，积极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1943年10月，中国得以与美、英、苏共同签署关于世界普遍安全的宣言，对战争和战后和平问题作出权威性安排。同年11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最高级会晤，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就战时及战后的军事、政治、经济极为广泛的议题交换看法，共同商定对日战争大计，发表《开罗宣言》，声明在彻底击败日本后，必须将满洲、澎湖列岛和台湾归还中国。中国能联署《世界普遍安全宣言》，出席开罗会议并参与制定有利于中国的《开罗宣言》，标志着中国正式跻身于“四强”之列，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曾对此做过中肯的评价。开罗会议后，中国积极参加筹建战后国际组织的工作，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并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取得对安理会的任何重大决议的否决权，第一次在国际组织中明确了它的重要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大国”的角色。

总之，在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制定了正确的抗战国际政略，其以开放的国际视野，以抗战到底、苦撑待变的方式，在强调抗战以争取民族独立之时，特别注意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中国之民族共同奋斗，强调将中华民族之命运与世界局势的发展紧密相联，将中国抗战与维护世界和平之大局紧密相联，自觉将中国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对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本文责编：程方勇

“江苏方志大讲堂”开讲

2020年4月15日，“江苏方志大讲堂”在江苏省方志馆开讲，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部分工作人员参加，同时推出线上版。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程章灿主讲。程章灿以《书香文脉说名山》为题，从金山的文宗阁皇家藏书楼、焦山的瘿鹤铭与焦山书藏、南山的昭明读书台与柳诒徵墓三个方面，挖掘地灵金山、书香焦山、人杰南山这三座名山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详细阐述镇江三山对中国文化传播与文脉传承的伟大贡献。

（“方志江苏”微信公众号）

of Wu. It served in nature as a gate to the King's city , and became a gate to the capital ci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Ming Dynasty. Mufu Gate was situated in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new city , presumably at what is now the Gulougang. The Gate was demolished along with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New City in early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bout the nature , location and period of existence of Mufu Gate is an initial study of the gates of the New City.

A Brief Account of Kuominta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ategy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uo Yuhe (80)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scal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the Kuomintang gradually developed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ategy. The strategy featured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 fa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ircumstances ,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 and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world war. It linked the solution to China's problem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by way of arduously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to the end in the hope of a turning point , and consciously integrated China's resistance into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alizing the objective of achieving China's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As was proved by facts , the Kuominta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ategy was suitable for the reality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 won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 and ha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victory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New Fourth Army'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Jianghuai Region Pan Hong , Li Guo (87)

The New Fourth Army was formed after the outbreak of China's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1937 by integrating the guerrillas left behind after the Red Army began the Long March. The New Fourth Army Headquarters were established in December , 1937. Although their locations kept changing , their activitie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Jianghuai region. Following the Red Army's fine traditions and absorbing the Jianghuai regional culture , the New Fourth Army put great emphasis on it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s of the united front. Its culture was truly national , popular , and scientific.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the New Fourth Army's cultural construction not only promote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enhanced the reput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but also cultivated mainstay forces for the people's army and constructive forces for the New China.

Japanese Expats and Prisoners of War and Their Repatriation After the Glorious Recovery of Taiwan Xu Zhimin , Liu Xiaoxin (94)

After the forced "cession of Taiwan" by the Qing regime in 1895 ,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ished to recover Taiwan but in vain. It was not until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at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began to plan its recovery. At the victory of War of Resistance ,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ppointed Chen Cheng as chief official of Taiwan Province , to take it over jointly with armed forces. The arrogant Japanese soldiers and immigrants stationed in Taiwan instantly became expats and prisoners of war. Taiwan Province set up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Japanese Expats , who ordered the Japanese prisoners of